

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
学术文库·文集系列

朱英◎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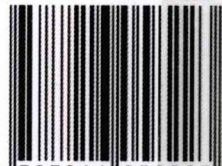
近代中国经济发展 与社会变迁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近代中国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ISBN 978-7-216-05822-3



9 787216 058223 >

定价：29.00元

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
学术文库·文集系列

朱 英 著

近代中国经济发展 与社会变迁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朱英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12
(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学术文库·文集系列)
ISBN 978-7-216-05822-3

I. 近…

II. 朱…

III. ①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近代 ②社会发展—研究—中国—近代

IV. F1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6473 号

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朱 英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3.25

插页:3'

版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3 000

字数:365 千字

书号:ISBN 978-7-216-05822-3

定价:29.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前 言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自然而然地会回想起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历程。熟识的海内外学界朋友大概都知道,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展史学研究之初,主要是对当时史学界探讨很少的近代中国商会加以考察和分析,然后由此不断扩展和深入,兼及其他相关领域。这并非年青的我在当时即已具备了选取一个既有学术价值,又颇有发展前景的新课题这种能力,而是奉攻读研究生学位时的导师章开沅先生之命,与同门师兄马敏教授一起赴苏州参与整理和编辑卷帙浩繁的苏州商会档案,才得以涉足于商会研究这一新领域。对我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研究商会是一个命题式的作业或者任务,同时也是使我在学术研究中终生受益匪浅的一个重要选择。

本书实际上是一部论文集,并非专题性的实证研究专著,所以涉及的内容较多,有几点需要在前言中予以说明。

第一,就本书具体内容而言,本人有关商会研究的成果,包括论文和著作,迄今20余年来已经陆续多有问世,本书中也有部分内容论及商会,但并非全部围绕商会进行探析,也不是对其他某一个具体问题集中进行专题性论述,而是在伴随着商会研究发展过程中生发开来的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都关涉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这一大的范围,所以本书也以此作为书名。另外,还有几篇属于学术评述性的文章。

第二,从时间上看,收入本书的数十篇论文,前后也几乎相距长

达近 20 年。由于时间跨度长,各篇文章在某些问题的技术处理方面也有所不同。例如,早期的论文在注释的完整性要求上,与现今相比较并不十分严格,甚至可以说也不完全合乎学术规范。但在当时却似乎是史学界不成文的习惯。像报纸的注释,只注明“某某报某年某月某日”即可,现今却还要注明作者、篇目和版面。收入本书的早期论文,有大量注释涉及近代报纸,即是采取过去的这种简单方法,原本想按照现在的要求重新补全,但操作起来却十分困难。这些困难不仅仅是体现在查阅方面颇多难度,而且有些报纸在本地根本没有收藏,无法看到。所以,在本书中各篇论文有关报纸的注释并不一致。早期论文的注释仍保留了当时的简单状态,后期论文则采用了比较完整的注释方式。对于这种情况,在此需要向读者表示歉意。

第三,除了注释方式不完全一致,在先后不同时间发表的论文中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结论也有所不同,有的甚至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例如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商会表现与影响的论述即存在不同之处,尤其是对上海总商会“佳电”风波的分析和评价,甚至可以说前后判然有别;对于近代商人政治参与的考察与评价,前后也多有差异。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不应有的前后矛盾现象,而且收入本书时对这种不一致也并没有加以修改。这方面的情况之所以仍一如其旧,与上面所说之近代报纸注释有些仍采取过去简单方式又有所不同,并不是由于客观原因难以改变,而是有意保留下来。拙意以为,早期发表的论文中有些观点和结论,在后期的论著中有所改变,能够反映作者在不同阶段从事学术探索的发展历程,甚至也能够一定程度上从某个侧面具体地体现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不断进步。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有意识地保留了早期论文的原生态样式,没有进行任何修改。

第四,本书主要是选取过去没有收入相关著作的论文汇编而成,也算从某些方面对自己 20 年来从事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回顾,反映了本人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但是,受此限制,有关近些年自己对一些相关课题的研究,包括对商会和其他新领域和新问题的最新探讨成果,在本书中的体现并不是很充分。有关商会和其他商人社团的

新成果,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和《近代中国商会、行会与商团新论》两本书中,则有较为集中的反映,有兴趣的研究者与读者可以相互参照阅读。

目 录

前言	(1)
近代中国商业发展与消费习俗变迁	(1)
期待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向纵深拓展	(18)
乡村视野下的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21)
清末直隶农会	(24)
清末广东农会	(32)
清末全国农务联合会	(40)
经元善与晚清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	(47)
张謇的慈善公益思想与活动	(62)
开拓近代中国商人文化研究的初步构想	(76)
近代上海商人文化的特征	(89)
清末民初政治改良与商业发展关系论说	(100)
探寻商会“原生态”与“走出商会”研究商会	(108)
与时俱进的商会史研究	(111)
加强近代中国同业公会研究	(117)
清末苏州商会调解商事纠纷述论	(121)
论民初商会调和党争	(133)

五四运动期间的天津总商会·····	(150)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天津商会的改选及其困境·····	(166)
近代中外商会比较研究·····	(191)
自由职业者:近代中国社会群体研究的新领域·····	(202)
从社会群体透视社会变迁·····	(205)
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研究的几个问题·····	(208)
晚清地方势力的发展与中央政府的对策·····	(227)
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	(239)
戊戌至辛亥地方自治的发展·····	(260)
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与资产阶级·····	(279)
辛亥革命与商界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	(300)
民国时期省议会与省长之间的冲突·····	(319)
晚清史研究的新趋向·····	(340)
近代中国商团研究述评·····	(355)
“九五”期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	(370)
“年代”史:近代史研究的新视野·····	(386)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走向·····	(389)
附录:追寻历史的足迹	
——朱英教授访谈录·····	(402)

近代中国商业发展与消费习俗变迁

一、商业发展与消费方式的变革

随着经济和时代的发展,消费方式往往会出现相应的变化,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换言之,消费方式的变化,也是经济与时代发展变迁的具体表现之一。美国学者罗斯托在其《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甚至将消费模式作为划分时代的一个基本标记。在不同的社会与时代中,消费方式的变化又呈现出诸多不同的特点。例如在近代中国,消费方式的变革与过去相比较,即表现出涉及面广、变化大、影响深的显著特点,称得上是消费领域中前所未有的—场革命。

在近代之所以出现消费方式的重大变革,无疑是缘于新型经济也即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推动,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进而直接导致了消费革命的出现。

鸦片战争之后,洋货大量涌入中国,即逐渐对中国传统的消费方式产生了某些影响。例如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社会风气中已开始出现某种崇洋的倾向。“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灯曰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酱油,颜

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①不过,最初的这种变化主要还只是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尚不普遍。到19世纪末,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已增至70余个,清朝政府自开的口岸也有20多个。于是,洋货在中国的倾销更加畅通无阻,已深入到广大的中小城镇,甚至在某些乡村也不难见到洋货。例如在直隶的玉田,人们消费的洋货已“不可胜数”,“饮食日用洋货者,殆不啻十之五矣”^②;即使是在云南昭通偏僻之区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刺呢、哗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③,因而能够为普通民众所接受。

除进口洋货日益增加之外,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各国又通过逼迫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设厂权,从而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就地生产和销售各种商品。在此之前,洋商虽已在中国的某些通商口岸建厂,但为数较少,也未取得合法权利;甲午战争后则不仅获取条约的认可,而且建厂数量急剧增加。于是,在中国本土制造的各种洋货更加充斥市场。由于其价格较诸进口洋货更低,所以也更易深入中国普通民众的家庭,以至于“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资财,何可悉数”^④。洋货的日趋普及,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人消费方式的变革。

不仅如此,洋商还将西方的生活与消费方式也直接引入到中国。包括在租界建西式洋楼和西式马路,参与赛马、赛船、网球、足球、业余剧社、公园或室内的音乐会等。同时,洋商还在中国创设许多与新

① 陈作霖:《炳烛里谈》,转引自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下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重印本,第300页。

② 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页。

③ 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

④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9页。

生活与新消费方式直接相关的公用事业。例如在上海租界,1862年即出现了第一条西式马路——静安寺路;1865年首次安装了煤气路灯,并建立了第一条陆路电报线;1874年法国商人米拉从日本引进第一批人力车;1882年英国商人创办的上海电光公司开始设置路灯;次年又架设自来水管首次放水;1908年有轨电车通车,1914年无轨电车也开通。所有这些,最初虽主要是服务于租界的外国侨民,但也无不影响到中国人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的改变。不久之后,在上海南市的华界也相继出现了电灯、电话、汽车、自来水,并仿照租界改建和新建了多条马路。如徐家汇一带“市面大兴,既而电车行驶矣,邮政设局矣,电灯、路灯、德律风、自来水次第装接矣。……日新月异,宛似洋场风景”。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并获得发展,更进一步导致普通民众消费方式的变革。随着工商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模式以及相应的消费方式都不得不发生变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破坏之后,许多人被迫离开土地进城当学徒和做工,连妇女也进入纱厂或丝厂谋生。这样,传统的消费方式自然随之改革。过去的家庭多是以土布自制衣服鞋帽,现在则以做工的收入购买包括衣服鞋帽在内的各种新式消费品。即使是在农村,也有越来越多的农户,因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开始从事商品化的农业生产,手中拥有了一定的货币,从而得以购买一定数量的新式消费品。清末民初的湖北蒲圻县即有不少农户种植茶叶和麻,“民国元、二年来,茶价与麻价互涨,财力既裕,居民遂奢僭无等”,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仿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①。

奢侈的高消费过去仅仅是限于官僚、地主之家,因此官僚云集的京城往往也是消费之都。到近代,其情形则发生了某些变化,消费之都开始向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转移。不仅如此,工商业越是发达

^① 宋延斋:《蒲圻乡土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

的地区,消费方式的改变也越明显和越迅速,这一特点更进一步表明消费方式的变革与工商业的发展紧密相关。例如上海是近代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消费方式的变革在上海即显得十分突出。

开埠之后的上海,进出口贸易发展之迅速和商业繁荣之程度都在全国名列前茅,也是富商大贾能够纵情享乐而流连忘返的好处所。相比较而言,上海可以说是最早模仿和接受西方生活方式而出现近代消费革命的大都市。即使是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杭州,与生活方式令人眼花缭乱的上海相比,也多有不及之处。19世纪70年代初的《申报》即曾发表过这样的文字:“凡中国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惟洋泾浜一区几于无微不至,无美不臻。”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从消费观念、消费方式等各方面的迅速变化看,清末民初的上海都堪称翘楚。在晚清,西方的许多娱乐消费方式已传入上海,使得“蕞尔一弹丸地”的上海,能够“举中国20余省,外洋20余国之人民衣于斯,食于斯,攘往熙来,人多于蚁。有酒食以相征逐,有烟花以快冶游,有车马以代步行,有戏园茗肆以资遣兴,下而烟馆也、书场也、弹子房也、照相店也,无一不引人入胜”^①。文人墨客描述近代上海商业之繁华和娱乐之丰盛的各种词句更是数不胜数,诸如“海天富艳,景物饶人”;“孤冢荒郊,尽变繁华之地;层楼高阁,大开歌舞之场”;“华屋连苑,离厦入云,灯火辉煌,城开不夜”等等,这些都表明洋洋大观的上海是一个使人乐不思归的好地方。中国古代的商人大多崇尚节俭,所获利润主要用于购买田地,但及至近代其消费观念也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在上海各种娱乐场所奢侈消费大摆排场的各色人等中,即不乏发财致富的商人。一些大商人的交易谈判,也改在娱乐场所进行。可见,上海的现代生活对商人也有相当的吸引力。同时,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又给商人提供了更多的赚钱机会。

有些研究上海历史的学者认为,畸形发展的近代上海,称之为当时中国的色情消费之都或许并不过分。这也是近代中国消费方式变革过程中色情消费泛滥的表现。当时的上海滩上,可谓妓院林立,名

^① 《申报》1890年12月1日。

花如云,人称“十里洋场,粉黛三千”,“妓馆之多甲天下”。据20世纪20年代上海知县估计,上海妓院“有名数者,计千五百余家,而花烟馆及咸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与焉”^①。上海妓女的人数也多得惊人,根据20世纪初上海工部局和公董局的报告,租界华人女性中妓女所占比例高达12.5%。在近代上海,狎妓冶游已公开化,其方式有叫局、吃花酒、打茶围、乘车兜风、听书、吊膀子白相等,种类之多颇有使人应接不暇之感,这种现象在其他许多大城市中是不多见的。有人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无论男女,一入上海皆不知廉耻”,“上海男女淫糜无耻,为中外所羞言”。但更多的上海人,特别是上流社会并不以此为耻。当时在上海流传的所谓“七耻”中,有一耻是“耻狎么二”。之所以“耻狎么二”,乃是因为“么二”系地位很低的次等妓女。而能够与那些地位较高的“长三”妓女厮混,则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大张旗鼓地开展选花榜的活动,也反映了上海风流场的兴盛。选花榜即是在妓女中选美,1882年已在上海开始举行。许多报刊为此大肆宣传,不少文人与嫖客各自为其钟情的妓女捧场,有时相互之间因笔墨官司闹得不可开交。妓女一旦榜上有名,立刻身价百倍,其大幅玉照登于各家报纸,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与狎妓冶游成风的社会习俗相适应,上海的色情业也较诸其他城市更为发达兴盛,商人非但自身可以躬逢于花天酒地之间,而且还能通过发达的色情业赢利增财,遂趋之若鹜乐此不疲。

从这方面看,近代的上海似乎又是一个藏污纳垢的黑色大染缸,消费方式的变革也存在着不良倾向。小说《文明小史》第14回所写的一件事也反映了一部分人对上海这方面的憎恨:一位青年执意想去上海读书开眼界,他的老太太表示强烈反对,并说“少年弟子一到上海,没有不学坏的,而且那里的混帐女人极多,花了钱不算,还要上当。……有我一日,断乎不能由你们去胡闹的”^②。确实,近代的上

^① 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554页。

^② 参见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海在当时的许多中国人眼中似乎是一个花花世界,在这个花花世界中人人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最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聪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狡猾;最古怪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漂亮;拖着鼻涕的小姑娘,不多时可以变为卷发美人;音眼眩和扁鼻的女士,几天之后可以变为仪态大方的太太。”^①

总之,近代的上海是一个神奇的经济中心和消费魔都。这种神奇不仅体现于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一个以往不甚起眼的小县城一跃成为远东巨埠的大上海,同时,它又是一个无奇不有、光怪陆离的万花筒,既使人惊讶赞叹,又受人指责攻击。尽管如此,上海仍以其强大的神奇魔力,吸引着全国各地乃至西方各国一批又一批的新移民。

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中国消费方式变革的过程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的趋向:

一是趋新赶时髦。这实际上也是近代中国商业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消费方式变化中表现出的这种倾向,显然是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例如在商业发达的上海,各业商人无不以种种标新立异和赶时髦的方式,千方百计引导人们加入消费新潮流,以便从中获取厚利。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推崇各种时髦之举。19世纪末的《申报》曾发表文章对这种盲目趋新赶时髦的风气予以批评:“此邦之人钮于时尚,惟时之从,一若非时不可以为人,非极时不足以胜人。于是妓女则曰时髦,梨园竞尚时调,闺阁均效时装,甚至握管文人亦各改头易面,口谈时务以欺世子。”^②受其影响,追赶时髦的消费方式与习俗也日益突出。近代上海的风气即时时变更,以至“三数年间,往往有如隔代”。特别是“有客籍之人旅游过此者,谓之较之两三年前街市有不同焉,以沪上求时新,其风气较别处为早,其交易较别处为便。而不

^① 陈旭麓:《论“海派”》,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8页。

^② 《申报》1897年7月14日。

知在土著之人观之,则凡诸不同者,不待两三年也,有一岁而已变者焉,有数月而即变者焉”^①。类似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于上海,在其他许多城市中也大都如此,只是变化的程度和速度不及上海,其原因则是其他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也远远不及上海。

二是日益将消费与社交或交易联在了一起。在传统社会中,除了交友和增进感情联络之外,消费一般都是单纯的消闲享受性活动,其方式也比较简单。而在近代,消费的目的则日趋多样化,有的是为了从事一般社交活动,但应酬拉关系也成为其中非常重要的目的之一。尤其是对商人而言,所谓社交实际上也是为了建立人际关系网,了解各地行情,广泛招揽生意。正因为如此,消费变得更加奢侈豪华,而且方式也五花八门。包括到烟店开烟灯,上茶楼打茶围,赴酒楼设宴叫局,上妓院吃花酒,进赌场碰和赌牌,以及到戏场看戏和在书场听书等,都成为非常时新的消费方式。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惜耗费巨资。近代上海报界文人包天笑曾说:“上海那时的风气,以吃花酒为交际之方,有许多寓公名流,多流连于此。”^②《沪江商业市景词》也描述道:“各行贸易待评量,借作茶楼聚会场。每至午申人毕聚,成盘出货约期忙。”无论是社交还是交易,一旦与侈糜豪华的消费联在了一起,即大多带有某种功利色彩,而不再是单纯的情感互助行为。有的甚至是出于欺诈目的,通过交际酬酢谋取不义之财。

三是盲目崇洋和讲求虚荣。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和消费方式的变化,传统的习俗受到猛烈冲击,中国人在生活方式和日常消费等方面,盲目崇洋和讲求虚荣的倾向日益明显。特别是在青年阔少中,崇洋心理十分盛行,“他们看着外国事,不论是非美恶,没有一样不好的;看着自己的国里,没有一点是好的,所以学外国人惟恐不像”^③。当时曾有人作词讽刺这种盲目崇洋的行为:“洋帽洋衣洋式样,短胡两撇口边开,平生第一伤心事,碧眼生成学不来。”在交际酬酢日趋

① 《申报》1897年7月14日。

②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359页。

③ 《大公报》1903年4月17日。

盛行的风气之下,讲面子、图虚荣的消费性格也随之产生。从当时的生活水平看,奢侈的消费毕竟只有少数富裕者能够承受,但那些并不富裕者为了虚荣,也常常摆阔气,穿时髦西装,出入酒楼妓院,而实际上是“外若繁华,中多拮据;外似有余,中多不足”。“今年之受债主逼辱者,皆昔日扬扬得意目为阔少者也”;“今之被锦绣而乘车马,饫粱肉而炫珍奇者,皆家无担石储者也。至于冠婚丧祭其素丰者,既动费不貲,其素歉者亦耻居人后,岂知争一时之体面而费数载之补苴,甚非计之得者乎旨哉”?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流行的商业化、功利化社会风气有着密切关系。由于“风俗日漓,见有高车驷马美食鲜衣之客人皆敬羨,即日事借贷人亦常能应之。若布衣粗食徒步独行之人,虽品行端方,文章华美,人亦望望然去之矣”^①。在这样扭曲的社会风气之下,迫使许多人都不得不讲求表面上的虚荣。

四是打破了以往在消费领域中的等级尊卑观念。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尊卑有别,等级森严,这种现象即使是在消费领域中也多有体现。例如服饰、器皿等被视为社会等级标志的高档次消费品,过去一般都是王公贵族、宦官士绅享用,普通民众则无法染指。如果贸然使用就会被认为是僭越,引起封建贵族的强烈不满和谴责,甚至带来不测之祸。到了近代,由于工商贸易的发展和观念意识的变化,消费已逐渐成为大众的消费,传统的消费等级观念也被打破,消费中所受到的唯一限制是金钱,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享受一切。过去,“商贾不衣锦,中产家妇女无金珠罗绮,士大夫一筵之费不过一二千钱”,现在,“无论士庶舆台,但力所能及,衣服宴饮,越次犯分不为怪”,“向时缎衣貂帽,例非绅士不得僭,今则舆台胥吏亦有服之。一切器用必用红木、楠、梨等。寻常燕[饮]享,无海错山珍,群以为耻”^②。特别是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种变化更为突出。例如上海滩上“几至无人不绸,无人不缎”,“优伶娼妓之服金绣者亦几视为

^① 《申报》1876年5月22日。

^② 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6页。